

一生砥礪在精勤

洗玉清與順德文人的交往及其順德歷史人物研究

李健明*

作為嶺南著名的女歷史學家，洗玉清不僅鉤沉了不少不為人知而極有價值的順德歷史人物資料，對順德歷史人物的研究實有開創之功，為後世研究順德歷史人物提供了翔實精闢的素材。本文從洗玉清與順德文人交往入手，追尋她當年對順德歷史人物史料進行系統梳理的貢獻。

洗玉清（1895-1965），現代著名廣東文獻專家、中山大學教授，曾任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嶺南大學文物館館長。她還是一位傑出的女詩人、女畫家。洗玉清治學嚴謹，著述良多，畢生致力於嶺南文化歷史人物的發掘與系統研究，開一代風氣，被學界譽為有“漢代班昭”、“宋代李清照”之女史詞家文才。

洗玉清一生與順德結下不解之緣，早年她曾向國學大師黃節請教詩學，她後來的重要著作《廣東女子藝文考》和《流離百詠》皆請著名順德籍詞人黎六和題辭。在中山大學期間，她又



洗玉清（1895-1965）

與順德籍教授、著名人類學家梁釗韜一起整理文物館文物。她大量的著述中多有專門系統地整理及論述順德歷史人物的生平著作，發前人之所未發。尤其是她對順德文史資料心細如髮的閱讀與慧眼獨具的爬梳，為我們提供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生動地復原了順德歷史人物真實的面目。

洗玉清的著述和思考為後人認識順德歷史人物和文化風貌開拓了一個極具人文價值的學術視野。

*李健明（1966-），廣東順德人，《珠江商報》編輯，長期從事珠江三角洲歷史文化和近代文化學人的研究，尤潛心於順德鄉土誌和人物傳記的研究，現任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作家協會主席、順德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

洗玉清與澳門

1895年1月10日，洗玉清出生於澳門。她家原籍南海縣西樵鎮簡村，因清末太平天國期間，祖父為避戰亂，舉家它遷。父親冼藻揚出生於澳門，十五歲輟學，後隨親人經商，終有所成就。

洗玉清一直對澳門深懷柔情。她在自傳中有道：“我八歲開學，在一個林老虎的私塾讀書，九歲至十一歲，在澳門啟明學校肄業，該校教員是很開通的，那時已學體育、算術、地理、唱歌等科目了。後來，我父親訪得一位陳子褒先生，學問是極好的，開了一間灌根學校，父親命我往遊陳門。”⁽¹⁾

這位陳子褒先生，名榮袞，號耐庵，新會人，三十一歲參加鄉試，中第五名舉人。他積極參加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維新變法。光緒二十五年（1889），他發表〈八股文言之禍亡中國〉，深得有識之士好評。他是中國主張應用語體文的第一人。陳子褒後來東渡日本，專門考察日本的中小學教育，回國後立志改良小學教育，用語體文編輯教科書多種，曾在澳門和香港創立學校，灌根學校便是其中之一，陳子褒成為近代中國文化教育革新者的先驅。

洗玉清在子褒學堂讀書七年之久，極受老師和校長器重。她深受陳子褒務實的現代教育理念、愛國救民的真誠思想與平實藹如的處世風格所影響。陳校長對她立意拯救中國也立意投身教育起了不可估量的熏陶感染作用。她一直珍藏着當年子褒學堂的畢業證書，決心伺機出版恩師的鴻文大著。

洗玉清在子褒學堂畢業後，往香港聖士提反女子學校讀英文，後轉入嶺南大學附中，並於次年升入嶺南大學學院，歷九年畢業，次年任嶺南大學國文系助教，其時是1925年，洗玉清剛好三十歲。

在此後的幾十年間，她曾在日軍進犯廣州時避居澳門，到晚年患病時亦重返澳門。因此，可以說

▷ 洗玉清先生早年行狀（佛山大學佛山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洗玉清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附录

洗玉清先生年表

庄福伍

1895年 1岁

1月10日（农历甲午年十二月十五日），先生生于澳門。原籍广东南海西樵镇简村乡。清咸丰年间洪杨之役，祖父母为觅生计，避居澳門。父冼藻扬，少孤食贫，年十五辍学，跟族人在钦、廉、高、雷一带从商。光绪廿五年（1899）沟通西江航业，倡办天和轮船公司。后在香港、澳门电灯公司、牛奶公司、麻绳公司等入股投资，并在港开设建昌茶药庄，为知名人士。母亲刘氏，是农家女。生有七子女：即长男秉钧，司理香港建昌荣药庄；次男秉芬，毕业于伦敦大学商科，后任广西梧州天和轮船公司经理；三男秉熹，留英时曾任中华民国驻英总领事署法律顾问及英国最高法院特约律师，后来长期在香港开业，为香港知名大律师；先生混排第三，弟妹都叫她“三姐”。因她独身不嫁，人们称她“洗姑”，更因她敦品励行、著作等身，在历史文献、诗词、金石书画等诸方面有卓著成就，人们又尊她为“洗子”。自署“琅环馆主”、“西樵女士”、“西樵山人”。四妹瑞清，五妹亮清均是家庭妇女；七妹妙清，则从事医务。

1903年 8岁

开始入学，在澳門一个名叫林老虎的私塾读书。

1904年 9岁

澳門启明学校读书。

1905年 10岁

澳門启明学校读书。

1906年 11岁

澳門启明学校肄业。

“九岁至十一岁，在澳門启明学校肄业，该校教员是很开通的，那时已学体操、算术、地理、唱歌等科目了。”（见洗玉清1958年12月25日〈自传〉底稿）

1907年 12岁

入澳門灌根学塾（即子褒学校），为陈子褒（荣袞）弟子。“在灌根学校读书七年，陈老师特别用心教我，我成绩也特别好，所以童年时代就颇有文名。”（见洗玉清1958年12月25日〈自传〉底稿）

1912年 17岁

澳門子褒学校中学普通科毕业。“我一生受他（陈子褒）的影响最深：也立意救中国，也立意委身教育。自己又以为一有室家，则家庭儿女琐事，总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师，难免失良母贤妻之职；想做贤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教师之职，二者不可兼，所以十六七岁我就决意独身不嫁。”（见洗玉清1958年12月25日〈自传〉手稿）

是年，于澳門镜湖医院恭聆孙中山演说。

1916年 21岁

1月，由其父送去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英文。

冼玉清的一生，諸如出生、開蒙、求學、避難、養病等重要經歷都是在澳門度過，澳門可說是冼玉清的精神聖地。她在自傳中也說：“我家住澳門，住了五代了。現在西樵故鄉也無人識，已視澳門為家鄉。”⁽²⁾ 她六十歲在中山大學填寫教職員卡時，仍舊在永久通訊處一欄中留上“澳門下環圍一號”作為永遠通訊地址。由此可見，冼玉清與澳門實已血脈相融而無法分割。冼玉清的著作、思想和事蹟亦成為澳門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與黃節答問作詩法

1929年，冼玉清在翰林學士江孔殷、嶺南大學國文系主任楊壽昌教授的引薦下拜見了嶺南詩宗黃節先生，從此拉開她一生與順德文人交往與研究順德歷史人物的序幕。

黃節（1873-1935），字晦聞，廣東順德杏壇鄉人，近代著名詩人、書法家、國學大師，“嶺南近代四大家”之一。少年時他在大學者簡朝亮門下讀書，後到廣州雲林寺苦讀十年。1905年，他在上海與章太炎、鄧實等人創辦《國粹學報》。1908年他與蘇曼殊、柳亞子等人參與發起成立南社。

1929年，黃節在北京閒居，受劉裁甫、梁漱溟等人之邀，回廣東任廣東省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在近代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吳宓的《吳宓日記》第四卷中記有此事：“李（李蒼萍）述在粵半年情形及經驗，及此次奉粵當局命，來請黃晦聞（節）先生赴粵主持教育事，宓乃贊之，謂黃先生必允前往。”可惜滿腔熱忱的黃節來到廣州就職後，諸事掣肘，無法順利開展工作，再加上蔣桂戰爭，省府主席李濟深被扣於南京，遂堅決辭職，赴澳門暫居。

當年夏天，冼玉清回到故鄉澳門，與黃節先生再度見面。黃節詢問冼玉清作詩方法，冼玉清回答說：“遠溯風騷，以明詩人風世勸俗、溫柔敦厚之教，與騷人忠厚纏綿、言情敘景之法。近探漢魏詩之造意，與六朝之造詞；而十九首之婉轉附物、惆悵切情，與陳思王之雋煉噴薄、阮步兵之腴厚遙深、陶淵明之沖澹精拔、大謝之奇麗

蘊鑿、小謝之清發風華，皆為詩學不祧之祖。下及有唐一代諸家之變化，和李太白之風韻超邁、縱橫飄逸，與杜工部思力之遒厚、沉鬱雄奇，皆詩學當循之門徑。”⁽³⁾

黃晦聞聽後，十分贊許，並說：“以此見子之學，而未見子之藝也。”冼玉清銘記於心。從此兩位嶺南詩人過從甚密，冼玉清更常讀《蒹葭樓詩集》以增學養，並習師詩法。

同年10月，冼玉清北上京華參加燕京大學校舍落成典禮。她來到大羊宜賓胡同的蒹葭樓再次拜見當時擔任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的黃節先生，自然地她不忘帶上心血之作《碧琅玕詩集》。據莫仲予先生在〈文史芬芳述館賢〉中介紹，冼玉清將手稿呈給黃節，黃節細讀後挑選出頗為出色的“竹籟遠喧來枕簟，荷裳暗解念池塘”，“陽春煦庶物，萬木華且榮。巖野抱幽秀，澹澹豐格成”等詩句，但他還是認為：“意境似從謝康樂〈登池上樓詩〉變來，惜造句未工耳。”並批下十二字：“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這語重心長的評語對冼玉清影響深遠，她後來一直謹記“務去陳言”追求“真切”的教誨，且遵守老師“務戒篇太捷”的真言，並在日後的詩歌創作中嚴格遵循此律，因而畢生詩作字裡行間始終散逸着一股真摯情感，冼玉清可謂為堅守黃節藝術創作思想的得意門生。另外，黃節曾對她講：“吾粵詩格之濫，濫於張南山。”告誡她力拒應酬之作。她也終生恪守師言，作詩甯少毋濫。

黃節去世之後，冼玉清在民國二十九年三月（1940）五號香港《工商日報》上的“黃晦聞追悼專刊”中特撰〈憶黃晦聞先生〉一文，回憶黃節先生先時對她講：“昔節庵語我，豐功偉烈，成不成有天意存焉，至以區區作詩豈亦不可能成就耶？節在以此勉僕，僕以此勉學也。”

由此可以看出，黃節沉雄鬱勃去陳出新的詩歌風格和沉潛篤定心無旁騖的治學精神，曾長久地影響着冼玉清，而冼玉清則畢生以黃節為楷模，潛心鑽研，不求聞達，最後也卓然成家。二十三年之後的1963年，冼玉清在《羊城晚報》上發表〈愛國詩

人黃節》一文，語句深沉，情繫於文，可見她確是無法忘懷。

潛心研究梁廷楠

1935年，洗玉清的專著〈梁廷楠著述錄要〉刊登於《嶺南學報》，這是洗玉清長篇論述順德學者的開始。

梁廷楠，字章冉，號藤花亭主人，清嘉慶元年（1796）出生在順德倫敦鄉一家書香門第。梁廷楠是近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戲劇理論家和劇作家。

作為民間名儒，梁廷楠一直擔任越華書院、越秀書院監院和學海堂學長等職務，但他畢生未正式入仕，到晚年才因曾積極協助欽差大臣林則徐禁煙抗英而獲內閣中書虛銜，因而他雖著作等身，卻難入宦俗眼目。洗玉清通讀其文獨具慧眼，很清楚這位藤花亭主人“於李黼平為學生，於陳澧為前輩。學問淹貫，著述宏博，而於史學尤精”⁽⁴⁾，特別是其著述“種類之多，範圍之廣，實近世所僅見也”⁽⁵⁾。據統計，梁廷楠共有著作三十四本，涉及史學、海外歷史地理、宗教、藝術、戲曲、詩文、防守及夷事、經學、金石等領域。作為後世史學家，出於責任感與學術敏感，洗玉清“為撰概要，而（以免）散佚至不易觀”⁽⁶⁾，其用心良苦。

《論語古解》是梁廷楠最早的著作，當時他才二十八歲，“取自僅迄唐三十餘家之說，摘與《朱子集註》異者，依次排纂，彙得十卷。”

雖然後世人多半祇知朱熹的《論語集註》，其實梁廷楠的《論語古解》實可補朱熹《論語集註》對名物訓詁的粗疏不足。如“有朋自遠方來”的朋，朱熹解釋為“朋，同類也”；梁廷楠則集各家之說云：“包氏咸曰‘同門為朋’，鄭氏玄曰‘同師為朋’。黃氏曰‘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為友’。”⁽⁷⁾梁廷楠雖不着一字評語而引用諸家之說，其釋語顯然比朱熹更到位。因此，書中大量引用了這些細微準確的前人註譯，澄清了朱熹充斥《論語集註》的那些含糊不清的解釋，彌補了朱熹空疏粗泛的缺陷，以更紮實而具體地訓詁註釋

前人著作，在折射作者樸實的理性治學態度與思想的同時，展現了作者紮實而深邃的學術根基與目光。因此，兩書對照參考更能讓讀者迅速抓住原著的思想核心。

此外，《四庫全書》收集的唐前論語註解本祇有三本，而梁廷楠卻收集了唐代以前關於《論語》的註解“三十餘家”，他還在作註時採集各家學說，與朱熹的《集註》相對照，從而達到作者“未嘗不足為學者廣見聞之一助，況其中又多與宋儒互相發明”的目的，而在字裡行間梁廷楠那深入細緻的考訂工作無疑是後人更順利接近前人思想堂奧的階梯。因此，洗玉清在細讀全書後認為：“溯自元明以來，學者祇知墨守朱說，而不問其他。觀此書知廷楠讀書上下千古，眼光甚銳，不同人云亦云之輩也。”⁽⁸⁾不過，她也指出其中之不足：“至書之內容，祇摘句加解，並非全解。”⁽⁹⁾其弱點是無法讓讀者通過此書得窺《論語》全貌，祇能與朱熹的《論語集註》相互對照閱讀，削弱了自身獨立的學術地位，這或許就也是此書無法單獨流傳影響廣被的原因之一。可見，洗玉清雖對其上下千古的銳利目光深表讚許，但對其不足也直言發論，體現了其正直不阿的謹嚴風範。

一般人論述梁廷楠雜劇創作和戲曲理論，多就事論事，而洗玉清卻從梁廷楠《曲話》中勾出了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原來其族父梁森精通曲學，在清高宗乾隆第五次南巡時曾承辦梨園樂班，於一年之前請大學者王文治精心創作新劇，“慎選諸伶色佳者充之”⁽¹⁰⁾，在西湖行宮敬獻供奉，“每演一折，先用黃綾底本恭呈御覽；輒蒙褒獎，賜予頻仍，森亦緣此陞官矣。”⁽¹¹⁾洗玉清因而認為，梁廷楠的曲學研究和雜劇創作影響的源頭應是梁森。雖然梁廷楠創作《小四夢》時說：“古今皆夢境也，普天下皆夢中人也。達者於所歷之悲歡離合，盡作夢觀。人在夢中，不知是夢，其歡合悲離之致，了不與真異，惟其既醒之後，則別之曰：夢而已，人死其情狀不可知，若猶一一記憶平生，則視生平所作，直醒後之夢耳。”⁽¹²⁾但她似乎並不否認梁氏創作戲曲也希望能得到社會

主流特別是政府官員關注這一微妙心態。後來，鄧廷楨為梁氏作序也多少印證了這一推斷。冼玉清對梁廷楠創作內心取向的闡述雖引而不發，卻無疑已暗揭其微妙之心態。

1834年，兩廣總督盧坤在越華書院設廣東海防書局編纂《海防彙覽》。後世一般人祇知道他是書局總裁，梁廷楠等五人為編纂，書頁中也明列梁廷楠祇是其中一人而已。但冼玉清根據《廣東海防彙覽》後序中的〈藤花館駢文〉一段文字，指出此書實是梁廷楠一手編纂，因為梁廷楠在後序中說：“是書成於道光，多至百餘卷，陳舍人（鴻墀）意，而余一手所為也。徵引既博，不免有大同小異，復閱自嫌繁衍，請於鄧解筠（廷楨）制府，薦集四君子者賞而節之，仍令余始終其事。故節後再有去留如今編。余撰例言並以是跋，詳其緣起曲折之故。甫定，而林少穆尚書奉命以海事來，索閱稱善。於是制府（鄧廷楨）仍依敏肅初志有恭錄進呈之議，則此跋體弗協，引裝時遂自除去，而今稿偶存，附記於此，他日有所考焉。”⁽¹³⁾

冼玉清鄭重地指出“現本《海防彙覽》無此跋，因預備進呈故除去。無此跋，人遂不知為梁廷楠一手所為，特為考訂於此。”⁽¹⁴⁾她不吝筆墨，為這位一直默默作出最重要貢獻的史學家正名立傳，以補前人之疏漏。

尤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梁廷楠就曾撰文介紹美國的政治制度：“彼自立國以來，凡一國之賞罰、禁令，咸於民其值得定其議，而後擇人以守之。”他贊歎說：“未有統領，先有國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¹⁵⁾冼玉清緊跟其後，精闢地指出：“梁廷楠極心儀於合眾國之法制。”⁽¹⁶⁾其實，在當時仍是清朝集權封閉的統治年代，梁廷楠出此言已可謂驚世駭俗，所以，冼玉清才作出如此評語。但那還不算，梁廷楠甚至放言縱論曰：“統領（總統）限年而易，殆如中國之命吏，雖有善者，未嘗以人變法。”⁽¹⁷⁾其潛臺辭毋疑是說，別人當總統可限年而易，當朝皇帝的位置實也可借鑒摹倣之，這在當時可謂大逆不道。不過，這種石破天驚的言論卻多少反映了當時一批眼界開闊

的智識分子們的共同心聲。可惜的是，這些發自嶺南社會最低層的智識分子們的聲音卻十分微弱，一直不為人所知悉，幸得冼玉清潛心收集，系統勾勒，為我們清晰地描繪出了一百多年前一位率先開眼看世界、理性得深沉、充滿血性的鄉間學者形象。

作為鄉間儒生，梁廷楠雖在諸多領域成績斐然，早已卓然成家，但此前祇是零散地留存在前人筆記和簡略的史書記載之中，如此系統地收集這位近代卓有成就的嶺南學者的著作並客觀地加以評述其學術地位者，冼玉清無疑地乃為首創之舉。迄今學界對梁廷楠的研究仍多空白，而冼玉清在大半個世紀前的梳理縷析，已凸現她深遠獨到的學術眼光與苦心爬梳之國學功力。

發掘一批順德才女

1938年，冼玉清的重要著作《廣東女子藝文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她“年來纂修縣誌，博搜群書，婦女專集，輒有過眼，隨手編目，所積漸多”的心血之作。全書收集了明清兩代粵籍名媛閨秀乃至外省來粵才女的詩作、著作，並分別作論述評價。該著作之學術地位，誠如黃任潮先生在〈冼玉清的生平及其著作〉中所評論的那樣，它“是廣東女子藝文專輯開山之作”。

冼玉清在後序中指出：“就地理分配，計順德二十二家，番禺一十九家，南海香山各十二家。（……）大抵吾粵文風，以廣州府之順德、番禺、南海、香山為盛，加以交通便利，易為風氣，作者之眾，理固當然。”⁽¹⁸⁾

作為擁有才女數量最多的地區，順德一直為冼玉清所注目。或許是同為歷史學家之故，她對清代女史李晚芳的文字引述尤多。

李晚芳，“清代康熙年間人，龍津（順德陳村一帶）處士心月女兒。（……）及長，適碧江（順德北滘）梁永登，守禮嚴密，以聖賢之學自期，研究經學，兼善制義，著論多前人所未發，同邑蘇珥、何夢瑤皆重之。”⁽¹⁹⁾蘇珥、何夢瑤都是當時廣東名重

一時的順德籍大學者，他們對這位“村落一女孩”如此敬重，足見其犖卓不凡。

李晚芳在自述中說自己“幸五兄一姊，俱讀父書，織紉之餘，竊隨諸兄姊後，留心稽古，雅慕昭（班昭）之為人，奇其志，嘉其遇，喜讀其書，因溯源而讀龍門之書，索玩久，若漸知門徑。”⁽²⁰⁾

我們不妨欣賞一下洗玉清引用的李晚芳關於《史記》及司馬遷的評論。李晚芳在《讀史管見·讀史摘微》中認為，《史記》的作者“其識甚高，其學甚博”，“其文峻潔雄偉，自成一家。”隨之筆鋒一轉，繼續寫道：“獨惜其立意措辭，多有憤忿不平之氣據於中，雖未藉立言為發泄，而靈臺未淨，則繫繫偏僻之私，往往吐露於字裡行間，故其文肆而不純，諧而多怨，究其本所失，失在自是而不知其過。”⁽²¹⁾

作為自命“村落一女孩”的李晚芳，一語道出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史記》的潛在硬傷，就是“私憤充溢”，此雖語出驚人，卻在情理之中。凡細讀《史記》的人們都會發現，司馬遷對他尊敬的人，常以深情筆觸敘述其事，即使是戰國四公子，司馬遷也獨愛信陵君，稱他為魏公子（其他幾位則僅稱君而已），甚用心刻劃之，筆墨精妙，令眼界甚高的李晚芳也不時贊歎其筆端的才情。她寫道：“篇中（〈魏公子傳〉）摹其下交貧賤，一種虛中折節自在心性中流出。太史公以秀逸之筆，曲曲傳之，不特傳其事，而並傳其神，迄今讀之，猶覺數賢人傾心相得之神、盡心盡策之致活現紙上，真化工之筆也。”⁽²²⁾

不過，相當理智的李晚芳認為，她對司馬遷作為史學家的這種做法持有不同看法：“深惜遷有如是之才，（設想）使其得聞聖人之道，則心胸開豁，必無救李陵之誤，又何致憤忿不平若此？（但她遺憾地看到）嘗觀報任安一書，忿君者十之六七，憤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無一言反諸己之內容，所謂自是而不知其過者，非歟？持是心而修國史，大本已矣。故平準封禪，盡屬謗書。諸傳諸贊，半藉以豎其憤忿不平之氣，入世而欲上繼知我罪我之心法，余未敢輕信也。”⁽²³⁾

作為直筆的太史公，司馬遷一直是傳統視角中完美無瑕的正面人物，而李晚芳卻劈肌剝理，窮追細察，不僅將前人大為贊歎的所謂直言抗命的形象輕輕推開，而且切進司馬遷的真實的內心世界，指出這位史學大家的學養與性情缺陷，頗見其類似於現代文學心理分析之精粹。當年大史學家陳寅恪堅決不作清史研究，蓋因避免感情色彩影響對歷史的思辨與評判，而這位鄉間才女冷靜而深刻的剖析，頗與陳寅恪不謀而合。怪不得龍門知縣伍鼎臣說：“深非馬遷之見而以是見駁之，（……）此固非有天才大學大識不能為斯論者。”⁽²⁴⁾

此外，對廉頗、藺相如的評論也可看出這位女史的卓越見識。她在《讀史管見》中說：“人徒以完璧歸趙、渾池抗秦二事，豔稱相如，不知此一才辯之士所能耳，未足以盡相如；惟觀其引避廉頗一段議論，祇知有國，不知有己，深得古人公爾國爾之意，非大學問人，見不到，亦道不出，宜廉將軍聞而降心請罪也。人祇知廉頗善用兵，能戰勝攻取耳，亦未足以盡廉頗；觀其與趙王訣，請立太子以絕秦望之語，深得古人社稷之旨，非大膽識不敢出此言，非大忠勇不敢任此事。”她又說：“廉將軍居趙，事業甚多，《史》獨紀其與王訣及謝相如二事，非略之也。見引二事，皆非常事，足以概略廉將軍矣。讀此可悟作史去取之法。”⁽²⁵⁾

如此一位深具史識直抒己見的女子，稱得上是順德具有理性思辨才華的智識女性典範。因此，洗玉清直接引用陽江才女謝方端序言：“今順德梁李孺人《讀史管見》一書，其摘微辯論，能洞悉深奧，而乃出於閨帷手著，斯亦奇矣！”⁽²⁶⁾她不作一語點評，祇是大段引用，其實多少有點惺惺相惜的意味。

李晚芳另外一本重要著作是在中國古代女子教育史上頗具爭議的《女子言行纂》。當年她編纂此書的目的是：“謹纂周漢以來名儒淑媛之嘉言善行，可以補周官戴禮之闕而裨於齊家之助者，采輯成書，漸附以己意。”⁽²⁷⁾

在總論中，李晚芳說：“女學之要有四：曰去私，曰致禮，曰讀書，曰治事。”她強調說：“蓋

婦德莫病於私，故去私為首。私念淨盡，則天理流行。天理者，禮也，故以敦禮次之。敦禮則耳目手足起居動作皆有規矩可循而不容越。然節目度數親疏隆殺具載於書，故以讀書次之。”⁽²⁸⁾

雖然後世不少學者對此有所批判，但李晚芳強調的是讀書對於女性的作用。她說：“讀書則見禮明透，知倫常日用之事，責備無窮，自當着力事事而不敢怠惰，故以治事終焉。——四者皆所以檢束身心，而立齊家之本，其敍有如此者。”⁽²⁹⁾

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她堅守這點底線顯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雖然那些多是四書五經或“女子規”等教化之書，但多少強勝於目不識丁者。《順德縣誌》對李晚芳的記錄十分簡略，幸得冼玉清鈎稽古籍，通過大量文字將這位清代傑出女史深邃的識見和雍容有度的為人處世形象勾勒出來，令後人得以一睹其豐采。

值得一提的是，冼玉清還將梁廷楠的兩位女兒行狀發掘出來。一位叫媛玉，一位叫媿玉，兩位皆“能詩文，通群籍”。且不說她們伺奉祖母以身相殉的感人事蹟，重要的是林則徐在其姊妹著作《同懷剩稿》的題辭中說，廣東海防地圖數萬言的“蠅頭小楷”都是出自這兩位閨閣才女之手，令他十分驚歎與羨慕，同時又令他深感惋惜，因為梁廷楠告訴他，這兩位不櫛進士都在如花年華過早凋零，令重檢舊書的林則徐發出“世事滄桑遷流無極”的感歎。梁廷楠在《藤花亭書畫跋》中對當年的回憶誠足以豐富這段史實：“稍獲餘閑，兩女必啟櫝淪茗，就明鏡雲榭開窗研墨濡毫以待，胸中塵垢，至是頓消，目養心怡，全神畢注。”⁽³⁰⁾此真乃人生快哉之勝事。可惜，一切都已風流雲散，幸有冼玉清為我們留下當年的雪泥鴻爪，不然一切早已湮沒在歷史的煙塵裡無人知曉了。

另外，從林則徐為《同懷剩稿》題寫的文字中，我們又可反證當年梁廷楠自述獨撰的《海防彙覽》的確所言不妄。因為林則徐在文中也說：“……蓋廣東海防彙覽局備纂底稿（……）梁章冉文廣（廷楠）實總其事。”⁽³¹⁾可見他非常清楚當時的細節，祇是不便直說而已。細心的冼玉清卻在另一本書裡面不

露聲色地傳遞了這一重要信息，讓有心的研究者自行接駁片言隻語，用心良苦。

另一位被冼玉清發掘出來的人物就是清暉園的四小姐龍吟薌。她是龍令憲的四姐，在光緒三十年（1903）去世。冼玉清提到龍吟薌的《蕉雨軒詩集》乃“多寫情之作”，引用〈端午清暉園即事〉一詩：其中“綠葉成蔭春又去，清波依舊水長流”，神思頗見搖曳，足現閨秀風韻。龍家族人，女性雖多，但名難附經傳。不過，龍吟薌經冼玉清鈎沉發掘，已可補縣誌之不足。尤其珍貴的是，冼玉清順帶將龍令憲在《五山草堂》裡面描述清暉園的詩歌悉皆隨錄附帶，為我們提供了一百多年前這座私家名園的原有風貌，不妨借此一讀而共賞之：“我園清暉，在城南隅，有池有館，八九畝餘。中植嘉木，千百為株，色花聲鳥，四鼓周如。以鳴代琴，以讀我書。畦蔬初熟，廚釀盈壺，興來不淺。弄翰執觚，抗古暴哲，風於唐虞。”⁽³²⁾

順德二十四位才女，經冼玉清在浩瀚典籍中剔除塵埃，將她們的才情、品格、豐姿一一描摹勾出，復原了昔年美貌，重現了當年閨閣教育的素質和社會風尚，更為後人研究順德乃至廣東明清時期民間女性教育提供了一份翔實的珍貴史料。

對順德鑒藏家的研究

廣東鑒藏之風，冼玉清指出乃在“嘉道後始盛”。她認為，研究這些前人把玩的珍品，不僅可以解讀不同時代的社會風貌和文人情趣，更有助於考證訂訛，釐清前人謬誤。因此，她曾收集研究自明代到近代的五十位廣東著名鑒賞家，其中有八位是順德人氏，對他們一一細加評述。她心細如髮，指證謹嚴，往往可補前人論述之不足。例如，她介紹龍山人溫汝遂就講他：“專心畫竹，以己意造未新法，好事者每以炙鵝換之，傳播日下，為成邸所稱。”⁽³³⁾乃以黃庭換白鵝式的文人雅事折射溫汝遂推陳出新的藝術創作精神與平易瀟灑的生活情趣。這一軼事在《順德縣誌》中沒有記載，實可補其遺缺。另外，冼玉清還介

紹溫汝遂收藏有元朝大書畫家吳鎮的竹卷，這又為我們解開了畫家點染墨竹得以超勝同儕的奧秘所在。精於收藏的溫汝遂在當時已名聞遐邇，“收藏家訂日期，具榼酒於珠江，各出所有，互為品評，殿者供其費，汝遂每出必第一。”⁽³⁴⁾ 洗玉清還告訴我們：“粵人治金石學者，當時推溫汝遂與潘有為為首。”⁽³⁵⁾ 潘有為是番禺人，乾隆年間進士，大學者翁方綱的入室弟子，為名震嶺南的金石權威，而溫汝遂能與潘有為雙峰並峙，可知其身手不凡。至於介紹溫汝遂的弟弟溫汝適，洗玉清祇花寥寥幾筆，就已形神畢具：“工人物，得陸探微筆法，善作草書，旁及篆刻。”⁽³⁶⁾ 她在結尾還透露了溫汝適藏有岳飛的墨迹，其收藏之富，不言自喻。在寫到李文田的泰華樓時，她對李文田擁有〈泰山石刻〉、〈華嶽廟碑〉的經歷娓娓道來，並以正史記錄補充之：“光緒二十年倭人內犯，文田疏請啟用恭親王奕訢，又奏請暫停舉辦皇太后萬壽慶典，其敢言為朝列所敬仰。”⁽³⁷⁾ 文如剪影，勾勒了這位癡書嗜文的大學者那鯁直忠信的輪廓。

洗玉清簡述佛山名士梁九章工畫梅好奇石，並引用別人贈其輓聯“石多頑趣今無主，梅有花神亦哭君”，亦清晰地勾勒了這位融生命激情入清梅瘦石的性情中人的秀雅形象。而在論及辛耀文時，洗玉清獨拈其“藏品皆不蓋玩賞章，此則異於一般收藏家者也”⁽³⁸⁾，凸現其獨異流俗風姿卓絕的文士身影。

另外，有一位並非順德人氏的潘正衡，卻“雅慕黎簡，購其書畫盈室，因以黎名齋”。因此，後人評論說：“二樵三絕畫書詩，後世揚雲定見知。四壁蕭齋留手迹，可憐生恨不同時！”⁽³⁹⁾ 從中可見黎二樵的名氣。而上文提到的梁廷楠，也是一位收藏大家，洗玉清說：“年十四五即癖嗜鍾鼎文字。家藏宋〈宣和博古錄〉，晨夕摩挲不少釋。”⁽⁴⁰⁾ 他的祖父、父親皆大量收藏軸卷銘器，後亦皆歸梁廷楠所有，因此他不僅擁有“漢王氏鏡”、“唐煉形神治鏡”等珍貴文物，更擁有“周散氏盤”等稀世珍品，為他撰寫金石著作提供了難得的實證。

洗玉清筆下評騭那些鑒藏名家，皆擅場於捨形取神而點睛破壁，詳述鑒賞大家的藏品源流，勾勒各人的風骨神髓，使前朝人物呼之欲出，其精練的筆墨功夫，令人可從小中見大而感悟良深。這興許是洗玉清得力於長期浸淫經典鉤沉書海而自己又是位傑出詩人之故罷？

除上述專著外，洗玉清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就陸續撰寫了〈順德才女劉雪蘭考〉、〈順德之北田五子〉、〈何惠群之歎五更〉、〈黎二樵兩事〉等文章，而在《粵東印譜考》中也收集了李陽、老廷光等不為人知的民間篆刻能手的事蹟。作為一位嶺南傑出的女史家，洗玉清在撰述大量關於嶺南歷史文化學術論文的時候，將目光投向名人輩出的順德，且抱着“其文直，其事賅，不虛美，不隱惡”的宗旨，探賾索隱，考辭就班，終於成洋洋大觀，為後人研究嶺南珠江三角洲水鄉的順德文化歷史作出了承前啟後的卓越貢獻。

【註】

- (1)(2)(3) 陳樹榮主編：《洗玉清誕生百年紀念集》，澳門歷史學會出版，1995年出版，頁59；頁65；頁102。
- (4)(5)(6) 廣東省文史館、佛山大學佛山文史研究室編：《洗玉清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第一版，1995年8月第一版，頁29。
- (7)(12) 趙義山主編：《新世紀曲學研究文存兩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頁55；頁64。
- (8)(9)(10)(11)(13) 全(4)，頁30；頁30；頁35；頁35；頁46。
- (14) 《順德縣誌》，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 (15)(16)(17) 全(4)，頁50。
- (18) 洗玉清著《廣東女子藝文考》複印本後序，廣東省立圖書館藏。
- (19)(20)(21)(22)(23)(24)(25)(26)(27)(29)(31)(32) 全(18)：頁1；頁4；頁4；頁4；頁4；頁5；頁5；頁3；頁6；頁6；頁6；頁54；頁64。
- (28)(30) 全(4)，頁60。
- (33)(34)(35)(36)(37)(38)(39)(40) 全(4)，頁8；頁8；頁8；頁9；頁20；頁26；頁17；頁15。